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 目标、道路和动力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本文揭示了新时期我国“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内涵,得出我国将在2027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改革为强大动力,并把握好改革与发展的平衡点。

关键词:“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实现道路;实现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5—0005—08

明确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目标、道路和动力,有助于全面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

(一)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形成

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并逐步明晰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进一步细化为“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即第一步是在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我国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提出了新世纪的“三步走”发展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目标顺利完成后,我国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界定为“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就与中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08AJL001)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起来。这是因为,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我们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之所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在200多年间经历了一个由强变弱又由弱变强的“V”字型变迁。从各方面估算的数据来看,在1800年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超过30%,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肯尼迪估算了175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国在1800年所占比重高达33.3%,超过整个欧洲,到1830年还为29.8%,远高于英国的9.5%、美国的2.4%、日本的2.8%和法国的5.2%。^[1]麦迪森按照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高居世界首位,而同年,英国、日本和美国的GDP分别占世界GDP总量的5.2%、3.1%和1.8%。^[2]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进入了百年屈辱,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下降通道。1820—1870年的50年间年均下降0.37%,1913—1949年的36年间年均下降0.02%,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总量到1949年也迅速下降到5%左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到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GDP总量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是日本的2倍。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在如此之长的时间中实现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创造出比其他制度和体制更高的生产力和发展速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二)新时期“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内涵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指标主要有: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指标不仅包括了经济总量的指标,而且还包括了民生的指标,从而把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以GDP论英雄,要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经济结构明显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内需与外需的结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等。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这就要求强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全面小康社会是惠及全体13亿多人民的小康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体现公平公正。在我国目前城乡存在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就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一定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

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须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

2.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指标主要有:

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国实现现代化通常都称为发达国家,但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因而以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发展目标。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全面实现现代化,追赶和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将得到大大提升。

产业结构高级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高度融合,实

现新型工业化;新兴战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支柱和主导产业,产业技术和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服务业部门中的现代服务业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优势。

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幸福。居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居民收入差距大幅缩小,共同富裕目标基本实现;教育、卫生保健、文化、体育、娱乐、生活服务、社会治安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基本成型。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能源结构转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大幅下降。

中国的现代化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经济现代化作为先导,为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经济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扩展,最终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3. 我国有能力、有条件实现新时期“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4月1日会见欧盟主席范龙佩时明确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至少还有10年到20年快速发展机遇期。这个快速发展期,就是经济新常态所要求的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据测算,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只需要每年平均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这完全符合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要求。从近三年的经济发展来看,虽然我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的严重影响,但GDP总量仍然从2010年的40.2万亿增加到2014年的63.6万亿,年平均增加5.85万亿。按此推算,我国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100万亿以上,远远超出翻一番的发展目标。2014年我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59.8%多,在建党一百年时,GDP总量按美元汇率计算就会接近美国的水平。如果按近四年的GDP总量增加速度,我国将在2027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信息服务社(IHS)2014年9月5日发布预测认为,到2024年,按美元汇率计算,我国GDP总量为28.2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7.3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人均GDP来看,我国2013年就已达到6700美元左右,按世界银行2013年7月1日的国家发展水平分类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依据近几年我国人均GDP的增加速度,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将突破10000美元大关。再按此推算,并考虑世界银行每年调整国家发展水平分类标准的提高程度,我国大约会在2027年前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可见,中华民族几代人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咫尺,指日可待。所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到: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二、新时期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道路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我国保持较长时期的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为此,就需要做到: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虽然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表现在:一是解决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早在“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国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只是可惜在“八大”之后不久,我国的工作重心就偏离了这个主要任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天,虽然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二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必须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能够使全体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从而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明确讲到:“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3][31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

(二)坚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在新时期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提出的实现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理性选择。其核心在于:一是把发展的立足点从过去追求数量扩张转到追求质量和效益提高上来,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把发展的动力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到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三是把发展的需求拉动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转到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实现投资、消费、出口的协调拉动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必然选择。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造成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原因。日本1956—1961年间从美国、西欧等国大规模引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到1970年代初,日本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这期间恰恰是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直到1973年结束。韩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0.25%提高到1990年的1.87%。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1996年如阿根廷仅为0.4%,墨西哥为0.3%,马来西亚为0.2%,而且从1996—2009年的10多年间,阿根廷徘徊在0.4%—0.6%之间,墨西哥徘徊在0.3%—0.4%之间,马来西亚徘徊在0.2%—0.7%之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

(三)坚持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从而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发展;二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更多依靠城乡协调互动带动发展;三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以及实施“一路一带”战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亮点、新空间。

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是导致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种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19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1970年代的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1980年代的机械工业深化和高级化、1990年代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业发展并推行以技术开发和提高效率为核心的“产业合理化”。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相反,马来西亚长期过度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发展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业、天然资源贸易等产业,忽略发展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科研人才不足也阻碍了马来西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4]

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我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来看,2008—2013年的5年中,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据迟福

林的测算,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到2020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5]从城镇化来看,从2013—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还将以年均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这将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提出了巨大需求。有人估计,城镇化未来10年将拉动40万亿的投资。^[6]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来看,中西部的发展潜力巨大。中部和东北相当于东部的3/4,西部不到东部的2/3;从全面小康指标的实现程度来看,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70%,大约晚7年左右。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即使达到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也将支撑我国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从省份之间的绝对差距来看,2013年天津的人均GDP达到16000多美元,与贵州3700美元相比,相差4.3倍以上。

(四)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我国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却已进入了信息化的新时代,中国绝不能等实现工业化后再去推进信息化,否则就会重蹈1840年鸦片战争的悲剧。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走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通过工业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为城镇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城镇化的发展则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创造良好的空间和环境条件。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工业反哺农业,工业改造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依靠技术创新。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斯宾塞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达25年之久。^[7]我国虽然经过30多年的技术引进、学习和消化吸收,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但据韩国发布的《2012年度技术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12年韩中两国之间的国家战略技术水平差距为1.9年,而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为4.7年,这意味着我国与美国的差距长达近7年,该报告认为中国技术水平仅为美国的67%。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使我国至少还有10年以上的时间利用模仿、引进、集成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0月发布的《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投入的研发(R&D)经费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2%,达到2.08%。这意味着我国进入自主创新的新时代,对转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轨道具有标志性意义。

(五)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度和体制保障。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状况的比较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较低,如韩国的基尼系数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超过0.4;日本长期稳定在0.30—0.37之间;我国台湾地区1960年代以来始终保持在0.35以下。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如马来西亚为0.492(1997年),墨西哥为0.531(1998年),智利为0.571(2000年),巴西为0.553(2001年)。因此,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就需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需要做到: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既不是传统的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又不是完全的私有化,而是独创的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从而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在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使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2014年已有80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保证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引导力。同时,35年来民营经济获得了爆发性的成长,60%以上的GDP总量、70%以上的对外贸易、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新时期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主要体现在:

(一)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30多年我国深化改革的历程来看,中共中央先后推出了四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分别是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201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审视30多年来我国深化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表现出如下基本运动规律:

1. 改革存在着周期运动。当改革启动时,经济增长迅速进入快车道,但每一轮改革在带来大约5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后,新体制的活力和动力逐渐衰减,经济增长进入调整直至跌入谷底,新一轮改革的诉求又开始酝酿形成,这一变动周期大约为9—10年。这表明:一是我国改革是分阶段推进的。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总是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设计不同阶段的改革目标和任务,但每次有限改革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由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为下一轮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形成改革的良性循环和周期运动。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深化改革。这一方面是因为每次有限的改革,都只是逼近总目标,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每一轮有限的改革对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限的,当既有体制不能再促进生产力发展时,新一轮的改革就要开始了。改革的这一周期运动也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基本经济规律的存在并发挥作用。

2. 改革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吻合。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波动:从1981年的谷底到1984年的顶峰,再到1990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一个经济周期;从1992年的顶峰又到1999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二个经济周期;从2003年的高速增长,持续到2007年的顶峰,然后又掉入2009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三个经济周期。这三个经济周期经历的时间基本上是9—10年,符合经济周期的变动规律。^①当我们把这三个经济周期与前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酝酿和出台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会发现,每一轮改革的启动都是发生在经济进入调整和谷底阶段,如1981年经济跌入低

^①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就提出了9—10年的经济周期。经济学家熊彼特1936年提出经济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长周期为48—60年。

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出台第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经济增长达到这一经济周期的顶峰,形成新一轮的快速发展,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改革并非主动的,而是被逼的,是发展和民生的倒逼结果。这是因为,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改革。但如果不改革就无法发展,不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显,甚至激化时,改革就容易达成共识,并向前推进。所以,经济周期孕育了改革周期,改革周期促成了经济周期,二者互为因果。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意味着新一轮改革周期的开始,依据以往改革与发展相互关系的规律,新一轮“改革红利”即将到来,事实上已经到来。据统计,2014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形成新的创业热潮。从历史经验来看,1992年和2002年私营企业开户数都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前后出现一个高峰期,随后是5年的经济繁荣。

(二)新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新一轮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清理审批事项,构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为此,就需要政府制定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因此,这一轮改革的突出特色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所以,从政府自身改起,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的第一件大事来抓。

但是,以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推动型的。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也积累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政府推动的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政府自身改革的相对滞后的矛盾,而且后者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前者的深化。可是,政府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将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和敢于做出巨大的权力和利益牺牲。毕竟自己革自己的命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骨头越来越难啃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显然,这就需要寻求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新动力。但这个新动力必须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因为单纯依靠外在的力量是不可能推动改革成功的。因此,这个新动力应包括:

1. 政府的自觉推动力。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不是取消政府,而是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法制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在政府的有效领导下依靠政府的自觉革命才能有效推进。这就是《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的原因所在。

2. 人民民主的推动力。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这就意味着经济的民主体制已经形成。随着各个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形成,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就会自然产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这就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形成,就会形成推进改革的民主力量,在与政府推动力的合作博弈中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因此,改革只有实行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才能确保这一轮改革取得成功。

(三)改革与发展的平衡点

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取得改革与发展的平衡是确保改革能否成功,能否有效促进发展,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问题。因此,就改革与发展两者的内在逻辑来看,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解放生产力。这是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为发展而改革,改革只是实现发展这一目的的手段。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

2. 改革的依据是服从于发展的需要,即在发展的总体要求中推进改革。这实际上是把发展不仅作为改革的目的,而且又作为改革的起点,从而对如何实施改革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一要求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依据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来安排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滞后于也不能超前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对改革的优先次序作出科学地安排。二是要依据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具体承受能力来安排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不顾承受能力盲目加快改革,也不能惧怕困难使改革裹足不前,从而对改革的力度大小作出科学地选择。因此,2013年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参考文献:

- [1] 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186.
- [2] 麦迪森.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7: 11.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14.
- [4] 胡光耀, 林 昊. 马来西亚: 人才匮乏导致产业升级缓慢 [N/OL]. 新华网, 2013-3-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06/c_124421447.htm.
- [5] 迟福林. “十三五”: 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与改革 [N/OL]. 经济参考报, 2014-12-22.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4-12/22/content_100380.htm?div=-1.
- [6] 孙春芳. 城镇化10年拉动40万亿投资资金来源已有透支 [N/OL].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01-08. <http://finance.21cn.com/news/cjyw/2013/01/08/14303512.shtml>.
- [7] 林毅夫. 中国的增长奇迹是否可持续? [N/OL]. 参考消息, 2014-12-12.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4/12/12/595960.shtml>.

(收稿日期: 2015—03—13 责任编辑: 杨锦英)

Goals, path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new era

Huang Tai-ya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wo “centuries” at the new era, drawing the conclusions that China will exceed the U.S. in 2027 and becom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that in terms of GDP per capita, it will be rated as one of the high-income nations. To realize the goal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speed up the transition of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s the leading orientation, develop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simultaneously, make all the people become rich, develop the fundamental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e reform as the great driving force, and grasp the equilibrium point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wo centuries”; Development goals; Realization paths; Driving forces